

學術論文

後西方時代的新興國際關係議程，如何改寫西方與非西方關係？

Reinscribing West and non-West Relations: Emerging IR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post-Western Era

林婉萍 *Wan-Ping Lin*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PhD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本文從後西方時代的新興國際關係研究議程，探討國際關係學中，西方與非西方關係的演變，即：非西方如何從被動的知識客體，可能演變為共創知識的積極主體。透過檢視國際關係學中，非西方的角色與功能，本文發現：後西方時代的國際關係研究裡，非西方知識社群，正隨著新興國際關係議程開展，逐漸從驗證理論的經驗資料、西方國際關係學術模式的接收者，漸變為國際關係知識的生產者。非西方視角的比較與批判，豐富並擴充了後西方時代的新興國際關係議程，使其走向了比較國際關係思想研究，展現了國際關係知識中，西方與非西方相互構成，從而克服二元對立認識論，有助後西方國際關係從關係轉向的角度，重新想像國際關係。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evolution of West and non-West relations within IR scholarship along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emerging IR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post-Western era. It argues that the non-Wes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established knowledge co-producer with its deeper and broader engagement in the global IR communities instead of being the laboratories for testing given IR theories as well as the receivers of Western IR scholarship. The critical and comparative niches of the non-West have enriched and expanded the contents of emerging IR research making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IR thought a feasible and productive orientation. By reinscribing the co-constitution of the West and the non-West, it is not only possible to overcome the epistemic binary, but also to reimagine IR by changing referent in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關鍵字：西方與非西方關係、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比較國際思想、後西方國際關係

Keywords: West and non-West Relations, non-Western IR theory,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thought, post-Western IR

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國際關係學，就議題、途徑、方法、角度與目的等面向，進入爆炸性發展階段，其中一項前所未有的知識景觀是：非西方作為一經驗、觀點與研究資源的主體性，同時獲得了主流國關（mainstream IR）與批判國關（critical IR）的認可與召喚，並開展出各式各樣的研究議程與呼籲，比如：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Non-Western IR theory, NWIRT）¹、非西方國際關係思想（Non-Western IR thought）²、後西方國際關係學（Post-Western IR）³，乃至於全球國際關係學（Global IR）⁴等。

儘管國際關係學科邁入更加向非西方開放的時代，但非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方國關議程的參與者，而非議程設定者，非西方的貢獻與作用多半也沿著主流國關與批判國關的問題意識發展。概括言之，主流國關學者期望：藉由非西方的歷史經驗、概念、觀點，發展出多樣的國際關係理論，以便彌補當前理論研究之狹隘與不足，形成多元包容的學科，例如：NWIRT、Global IR 等。而批判國際關係學者則盼望：非西方的歷史經驗、概念、觀點，不僅能說出來，更可以被聽見，以便矯正國際關係學科的歐洲中心主義，改善核心與邊陲的認識論不平等，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例如：後西方國際關係學等。

然而，非西方經驗、觀點與研究資源，究竟如何逐漸從作為西方國際關係學科的沈默異己，轉變為擺脫西伐利亞式認識論的知識主體，並可能在比較國際關係學與後西方國際關係學，發揮知識優勢與能動性，又是另

¹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0).

² Robbie Shilli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on-Western Thought: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Investigations of Global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2010).

³ Rosa Vasilaki, "Provincialising IR? Deadlocks and Prospects in Post-Western IR Theory," *Millennium*, Vol. 41, No. 1(2012), pp. 3-22.

⁴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因此，本文嘗試以國際關係學中，西方與非西方關係的演變為經，新興國際關係研究議程為緯，一方面歷時性地檢視，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非西方角色與功能，另一方面說明非西方的貢獻與作用，如何能增益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及後西方國際關係學。由於談論具體的議程成果，必然涉及現有的研究案例，因此本文也將適時交錯地以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研究成果，具體而微地呈現某一種非西方經驗。

本文接下來分為四個部分，首先透過文獻回顧，梳理出非西方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角色，以及非西方作為知識主體的性質，並說明由這兩個認識角度的限制。其次，介紹兩種不滿國際關係學科西方中心主義，強調非西方知識主體的新興國際關係研究進路，即：世界化議程（*Worlding Beyond the West*）與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NWIRT*）。接著說明非西方知識社群如何穿梭其中，合縱連橫地回應這兩種研究取向，進而如何可能開展出，後西方國際關係學與比較國際關係思想。最後指出以非西方知識社群，在新興國際關係研究議程中，發揮了怎樣的能動性，產生了哪些成果，為國際關係研究帶來怎樣的突破與意義。

貳、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非西方：以中國大陸為例

一、主流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非西方：客體化的經驗資料庫

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最為批判理論所詬病處之一，在於將社會世界比照自然世界研究，即：自然科學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被理所當然地用於人類的生活世界，並認為這是探求超越時空、永恆真理的唯一準則。儘管許多科學史與政治社會學研究，已不斷揭露科學實證主義的缺陷，然而，主流國關仍堅持科學實證主義預設與取向，並以科學令旗，邊緣化其他類型的國關研究。

若參考歷史學、政治社會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等學門的研究成果，便會知道主流國關的研究取向，實際上是建構的信仰，即便是最科學簡約的

現實主義理論，亦是 1950 年代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在冷戰背景下，洛克菲勒基金會自 1954 年起，不斷資助、集結資本家、政客與國際關係理論家召開理論會議的成果，目的是拓展資本主義領地與利潤⁵。這種人為性，連自然科學理論也無法自外。然而，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依然強勢支配著主流國際關係研究的問題意識、理論關切與研究方法。在其視野下，西方與非西方皆是可以在外化（out there）的客體，國際關係現象、國際政治行為者及其行為，皆可透過抽象概念評估而數據化、資料化，成為驗證科學理論研究的經驗資料。

理論上，無論西方或非西方都在此同一的牛頓物理學宇宙觀中，被理性地客體化為任憑人類意識的標籤與量化的外在对象，然而，這樣的知識預設卻又與國際關係史與學術史的發展大異其趣。前者可以輕易識別、計算、解釋，後者充滿混雜、偶然、不可計量。John Hobson 歷史化 1760 年以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化的系譜，解構了國際關係學科及其理論理性、客觀的假象，實際上建立不當地預設在非西方情緒化、理智不足的二元對立之上⁶，Jennifer Pitts 亦從分析 18—19 世紀，歐洲思想家就國際法理原則，討論對如何對待非歐洲社會的爭辯中，指出同樣的文明/野蠻預設，曾被伏爾泰、萊布尼茲視為文明的中國⁷，在往後的 200 年間，逐步弔詭地淪為野蠻，並被排除在西伐利亞體系之外。國際關係知識並非來自科學實證主義，而是更多牽涉到西方如何認識非西方的問題。

一方面，在科學實證主義的範式下，非西方的歷史經驗被抽象的標籤與數字編碼，幻化為統計、方程式與模型。另一方面，從研究實務來說，西

⁵ Nicolas Guilhot, *The I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1954 Conference on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⁶ John M. Hobson, *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 Western International Theory 1760-201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⁷ Jennifer Pitts, *Bounda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方對非西方的偏見、無知與東方化，也是造成非西方持續在主流研究中，消聲匿跡的主因之一。比如：江憶恩在一篇檢討中國外交理論化的文章中曾指出，冷戰時期的美國根本無法得知中共外交的詳情，要從中共的角度來認識、理解中國外交行為，甚至將其理論化根本不可能⁸。而在後冷戰時代，歐美國關學界對東亞/中共外交行為也經常出現誤碼（*miscode*）、誤會（*misunderstand*），根本原因在於對既有理論的執著，而「忽視其他的解釋變項」⁹。換言之，儘管江憶恩說明了主流理論已經認識到自身解釋力的侷限，但不理解非西方的主流國關理論，仍僅能在其預設的框架中，不斷把非西方的經驗與歷史肢解為客觀的研究資料。

綜上所述，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非西方，是一個沈默、豐富、可依照理論假設，重新命名、編碼、統計，用驗證按照西方經驗所建立之理論的經驗資料庫，西方資料與非西方資料沒有什麼不同，然而可以檢驗的只有西方發展出來的理論，並在這種情況下，主流國關仍然持續客體化、他者化非西方經驗與歷史。這不僅使得主流理論，可以獲取源源不絕的材料進行滿足理論需求的研究，同時也能迴避自身面對非西方知識的東方主義疑慮與無知，從而使得主流國關能持續不斷站在科學範式的制高點，指點國際關係，引導研究。

二、非西方作為國際關係知識主體的性質：落後、依賴、抵抗

非西方不只因為在主流國際關係學中，被作為客體化的資料庫而失語，還在追求現代化的國際關係學科過程中，移植了西方國際關係學，加劇了恢復作為知識主體的困境。以下將以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科發展的經

⁸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nds in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the Asian Research, (2006), pp. 1-38.

⁹ Alastair Iain Johnston, "What (If Anything) Does East Asia Tell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2012), pp. 53-78.

驗為具體例子，說明非西方如何在非西方國際關係學科中，由於現代化、科學化的渴望，落入僅能追趕、依賴、抵抗西方國際關係學的陷阱。

(一) 現代化邏輯、向西方補課論：

Amitav Acharya 與 Barry Buzan 在其主編的《為何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根據其亞洲作者的論文，總結出亞洲未能產生非西方國際關係的五個原因，分別是：第一，亞洲國關研究者普遍認為西方已經找到正確理解國際關係的方法，第二，西方的成果豐富，亞洲只能學習並努力追趕，第三，西方國關理論具有葛蘭西意義上的霸權地位，第四，本土研究環境與期待，並不鼓勵追求理論，第五，本土理論發展條件存在，但需要被挖掘與創建¹⁰。換言之，在亞洲國關研究者的認知中，其國關學科發展仍落後、缺失與依賴西方。

同樣的情況在中國大陸也不例外。當代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者共享的一個普遍認識是：1980年以前的中國，沒有國際關係理論。而這個評價對於中國觀察家而言，顯得相當莫名其妙：對共產黨來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就是「理論」？而且，這種「理論」，不僅全面指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是倫理，具有「真理性」。然而，就算此馬列理論，非彼國關理論，那麼 1970 年代，毛澤東針對國際格局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算不算國際關係理論呢？從馬列毛主義衍生出來的、指導國際關係的理論，為什麼不是國際關係理論呢？類似這樣看似似是而非的「語言」問題，實際上反映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造成的深刻思想反轉。

1952 年，中國大陸改革高校，全面取消哲學與社會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唯一的哲學社會科學，然而經過 30 年，鄧小平提出中國的科學落後了，社會科學也落後了，中國的社會科學需要向西方補課。1980 年代，無論官方或民間大量往歐美輸送留學生，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補

¹⁰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9).

課」。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大陸國關學者主張：國際關係理論是向西方補課以後才有的，也暗示著：只有符合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那種定義、格式與作用的理論才是現代的、科學的。

這股留美潮培養出兩位中國大陸本土的國際關係理論家：外交學院的秦亞青院長，與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閻學通院長。他們約在 1980 年代中至 1990 年代初，在美國攻讀政治學國際關係博士，接受完整嚴格的學術訓練，並懷抱著回饋祖國現代化的使命感，畢業後即返國從事國際關係學科的現代化任務。

回到北京後，閻學通一面擔任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一面將美國的國際關係學教科書翻譯成中文，並接下擴建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學院的建設。而秦亞青則一面任教於外交學院，教授英語、國際關係學，同時，一面譯出西方經典國際關係學術作品，比如：E.H. Carr《二十年危機》、Robert Jervis《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並偶爾因業務需要從事外交工作。

對大陸學者而言，1990 年代是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科「進步」最快的年代，比如：大學紛紛設立國際關係學系所、招募大量國際關係專業研究生、國際關係學術期刊紛紛設立出版量大增、翻譯出版大量歐美國關經典書目、更多中國留學生出國研修國際關係、中國大陸各層級對涉外事務對官員的需求陡增等等。

（二） 中國失語、美國文化霸權論：

多數大陸國關學者從務實的角度，看待向美國學習建立中國國際關係學，是符合當時的國家政策，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之一。然而，也有部分從事馬列主義研究的學者，並不認為 1980 年代以前的中國沒有國際關係理論。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對於曾任外交部長、社會科學院院長宦鄉來說，向西方補課是為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事業服務的，馬克思主義仍是最高的理論。1980 年代的大陸國關研究者基本上持有類似觀點。

1986 年，如同政治上針對「中國市場主義經濟」妾身未明的曖昧性，需

要獲得合法性一樣，向西方補課的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科內部，出現創建「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呼聲¹¹。時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的趙寶煦主張，一方面要透過學習美國學術界、現代化中國社會科學，另一方面期盼由新的實踐、創造性地更新馬列主義。他認為這兩者都是為中國事業服務。在具體行為方面，他的提醒是：1. 對資產階級學術保有戒心、堅定馬列為指導原則、中國問題與立場為中心。不堅持馬列指導就可能迷失。2. 一邊探討、確認意識形態因素退出國際關係。3. 同時參考蘇聯與美國的方法¹²。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對於從馬克思主義轉行改教國際政治的老馬克思主義專家而言，沒有理論的說法也是有問題的，然而審時度勢，老馬列專家們改以提倡「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學，迎戰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美國化」的現象，比如：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梁守德、李石生。後者還專門為了馬克思理論的「現代化」刻苦鑽研。然而，在時代浪潮之下，這種現代化馬克思主義的努力，沒有引起大迴響，直到「中國威脅論」四起，「和平崛起/發展論」出台。

美國化的大陸國際關係學科與理論，只能默認西方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中國威脅論」，因此，如何抵抗這種論述，不只是文化霸權的問題，更是「中國崛起」的現實與理論，從而使得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化的爭論火熱起來，並加速了理論化進程，特別是中國大陸黨政體系用意與立場鮮明的呼喚「中國理論」、「中國話語」等號召，與國關學界「中國學派」之響應¹³。2004年，胡溫政府拋出「和平崛起論」回應「中國威脅論」，並主張中

¹¹ 王建偉，林至敏，趙玉樑，〈努力創建中國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體系〉，《世界經濟與政治內參》，第9期（1986），頁1-7；謝益顯，〈關於國際關係學的對象、任務、方法和內容之我見〉，《世界經濟與政治內參》，第9期（1987），頁34。

¹² 趙寶煦，〈補好「世界政治」這一課〉，《政治研究》，第2期（1987），頁1；李石生，〈關於國際關係學建設的幾個問題〉，《國際政治研究》，第4期（1996），頁86。

¹³ 郭樹勇，〈創建中國學派的呼籲—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綜述〉，《現代國際關係》，第2期（2005），頁59-61；俞正樑，〈建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 創建中國學派〉，《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第4期（2005），頁5-8；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

國哲學社會科學動起來，為中國崛起服務。此後，在大陸，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建構的議程，以及世界國關理論家對它的關注便一直方興未艾。秦亞青與閻學通也成為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時代的弄潮兒。

在主流國際關係研究中，無論是將非西方作為資料庫，還是認為非西方沒有國際關係理論或國際關係研究落後，都共享一種前提，即：非西方不會是國際關係研究概念與理論的供應者。換言之，國際關係知識只能由核心向邊陲、由西方向非西方單向輸入；且若非西方不加批判地接受這種預設，則將造成更嚴重的自我客體化的依賴後果，及其惡性循環。

參、批判國際關係研究如何賦予非西方主體性與發言權

歐美國際關係學界對非西方作為國際關係知識主體的重視，來自兩種研究取向：一為後實證主義陣營，比如以 Ann Ticker, Ole Wæver, David Blaney 等人發起的 *Worlding Beyond the West* (WBW) 研究系列¹⁴ 等，另一為建構主義、國際社會派，比如以 Amitav Acharya, Barry Buzan 發起的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WIRT) 等兩個研究倡議，以下回顧雙方對問題的認識與主張。

一、後實證主義陣營：

批判國關學界認為，國際關係學科以西方的經驗與思想傳統，建立疆界、議題與理論，因此，批判、反省國際關係學的歐洲中心主義，是批判

生成》，《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2005），頁165-176；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期（2006），頁7-13；王正毅，〈成為知識的生產者〉，《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期（2006），頁1；朱鋒，〈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與外交理論創新研究—新議程、新框架、新挑戰〉，《國際政治研究》，第2期（2009），頁9。

¹⁴ *Worlding Beyond the West* (U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ttps://www.routledge.com/Worlding-Beyond-the-West/book-series/WBW>.

國關研究的關鍵起點之一。Worlding Beyond the West 議程始於批判理論家 Steve Smith 發出的邀請，他與一些批判國關學者，不滿地認識到全球國際關係學，儘管已經具有共同研究的主題：世界，然而主流研究卻只圍繞著在歐美的經驗上，提出概念、途徑與理論化，使得國際關係學科事實上一點也不「國際」。

在國關女性主義學者 Ann Ticker、後殖民女性主義學者 Arlene B. Tickner 的響應下，2003 年 ISA 上首次以地緣文化場所 (geo-cultural sites) 為知識來源，組織圓桌論壇。之後，他們於 2004 Montreal ISA 規劃了多個相關的討論會與一整天的工作坊，召集了 35 位來自全球核心與非核心區的國關學者，與資深批判國關學者共同探討，出版「國際關係的地緣文化認識論」系列三部曲的研究寫作計畫。WBW 議程的目的在於：從去領土的角度，追求反映不同在地關切與傳統的地緣文化認識論，藉以恢復，並尋求重新想像國際關係的其他途徑 (alternatives)¹⁵。

2009 年 WBW 的第一本書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出版，收錄了 16 個不同地緣文化場所的國際關係學發展調查，其中部分章節曾於幾次 ISA 年會中發表與討論，包括 2005 年紐奧良的四個場次，2007 年芝加哥的一個全天工作坊，2008 年舊金山的一場圓桌論壇。在圓桌討論中，主張出版本書的目的在於：透過說明歐美以外的國際關係學是如何實踐的，來突顯歐美國際關係學的地方性，並呈現國際關係學的全球之旅，不僅反映了多樣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洞見，更突出多樣地緣文化場景的特色，影響著國關學者的特徵與條件，這種多元異質性的國際關係研究生態，終將可以改變核心—邊陲的不平等關係¹⁶。

WBW 議程透過不設限的創新主題、廣泛收錄、不斷出版的策略，徵

¹⁵ 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9).

¹⁶ 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9).

求所有反映在地關切與傳統的概念、地緣文化認識論、研究途徑等，生產國關知識的要素，一方面地方化歐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另一方面呈現多元地點（multiple sites）所實踐的國關知識生產、批判西方中心學術與決策、邊緣的理論或途徑，以因應後西方時代，國關學科面臨的政治與倫理挑戰。

包括自 2009–2013 年的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2009)、*Thinking International Differently* (2012)與 *Claiming the International* (2013)三部曲以來，WBW 至今已出版了至少 26 本專著，主題涉及批判國際關係知識、考察不同地緣文化場所的知識實踐、認識論、途徑、方法，以及非領土能動者，比如：非政府組織、伊斯蘭文化等與國際關係知識的關係¹⁷。

相對於主流國關，以要求驗證理論、探求因果法則作為合法的學術研究標準，WBW 則要求具體研究：邊緣/非西方，如何利用核心/西方的思考工具做研究、研究理論/途徑/方法旅行如何演變、概念在某些特定情境下的演變與意義、學科的知識社會學、不同知識生產者間的互動對話專業交流過程等。透過開放但實徵的研究方法，開拓這一議程對不同研究議題、方法與爭論的容量，並同時不分南北，向各方學者廣發英雄帖，以身作則，培養學科內多元平等尊重，實現真正的對話與包容。

二、建構主義、英國學派陣營：

除了批判國關以外，主流國關對理論研究現況不滿，且重視非西方知識社群者，就是來自建構主義、英國學派陣營的 Amitav Acharya 與 Barry Buzan。前者現今任教於 American University，後者任職於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他們於 2005 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所，聯合提出「為何沒有亞洲的國際關係理論」工

¹⁷ *Worlding Beyond the West* (U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ttps://www.routledge.com/Worlding-Beyond-the-West/book-series/WBW>.

作坊，開會過後，將主題改定為「為何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NWIRT)」。

根據 Acharya 在 2004 年 ISA 的論文與論文集致謝提到，原本這個工作坊是以探索「亞洲的國際關係理論」為題，¹⁸然而，在邀集亞洲各國國際關係學者齊聚一堂討論後，才發現他們無法直接探討如何進行亞洲國際關係的理論化，因為多數亞洲學者接受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為普世性的宣稱。因此，工作坊最後探討的是：亞洲各國的國際關係學科狀態為何，何以如此。最初於工作坊後提出的 7 篇論文，於 2007 年在為特集刊載於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第 7 期第 3 卷，包含來自中國、印度、日本、東南亞的個案研究，Acharya 與 Buzan 著作總論、前言、結論¹⁹。以此為基礎，添加了韓國、印尼、伊斯蘭文化與世界史的觀點等 4 篇文章後，由 Routledge 於 2009 年將合編出版為「為何沒有非西方國家的國際關係理論」一論文集。

儘管 Acharya 與 Buzan 大方將非西方知識社群帶入主流研究圈，批判國際關係知識的不對稱性，但他們對非西方國際關係的認識論興趣是有條件的，也並不像後實證主義陣營那樣具有開放與接受的同情理解。這是因為 Acharya 與 Buzan 各自對非西方知識資源有所期待，即：非西方概念、理論、方法等，如何推進他們各自的研究關懷。

Amitav Acharya²⁰ 本為知名多產的東南亞國際關係專家，以社會建構論研究東協安全合作機制聞名²¹。他自認為是國際關係的建構論者，強調

¹⁸ 2004 ISA Annual Meeting, "Why there in no theor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¹⁹ Amitav Acharya, Barry Buzan, "Preface: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R Theory: Reflections On and From Asia,"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Conclus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Non-Western IR Theory in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Iss. 3 (2007), pp. 285-286, 287-312, 427-438.

²⁰ 為加拿大籍的印度人，目前任教於華盛頓特區 American University，曾任 2015 年 ISA 主席，亦是首位非白人主席。

²¹ 其成名作為：*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東南亞國家間共享的獨特觀念，及其所構成的認同，使其實踐出與西方不同的安全模式。他在 1990 年代早期研究東南亞時，便察覺國際關係理論與東南亞區域研究的巨大鴻溝，即：國際關係理論根本無法解釋東南亞的國際關係。同時，身為浪跡澳洲、新加坡、加拿大與美國的印度人，他也反省過國際關係研究的種族主義問題，然而，這並沒有使他馬上大張旗鼓地主張結合國際關係理論與區域研究，以改善主流 IR 在研究關懷與視閥上的封閉性與西方中心主義，而只是埋下一個研究種子²²。

Barry Buzan 師承英國學派，實務上主要研究安全議題，但是他也對於擴大英國學派的影響力充滿抱負。正是在後冷戰時代，2000 年他與 Richard Little 合著一本具有雄心壯志、意圖改變國際關係研究的書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受到美國學界關注。同時，他也在中國大陸掀起如火如荼地本土國際關係理論建構運動時，自 2003 年至 2012 年多次應吉林大學劉德斌邀請，向亟欲建構國際關係理論之「中國學派」的中國大陸國關學界介紹英國學派²³。在與 Acharya 聯倡 NWIRT 議程後，Buzan 的活動身影便經常出沒在北京，當他拜訪外交學院時，接待他的則是當年全程參與 NWIRT 計畫，並提出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²⁴ 老朋友——的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

儘管 Acharya 早在 1990 年代就與 Barry Buzan 討論過國際關係學科/理論的局限性，然而兩人真正將此問題作為一個議程提出，是在現實世界劇烈變化，以及可合作的知識社群浮現的條件具足後提出的，即：當代國際關係研究與知識遠遠無法反應「其餘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rest)，特別

²² Clifford, S. "Theory Talk #42: Amitav Acharya on the Relevance of Regions, ASEAN, and Western IR's False Universalisms," *Theory Talks*, (2011), <http://www.theory-talks.org/2011/08/theory-talk-42.html>.

²³ 張驍虎，〈英國學派與中國學派的對話——「英國學派的發展與中國學派的建構」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外交評論》，第 1 期（2013），頁 156-157。

²⁴ Qin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是中國、印度等非西方大國的崛起²⁵。一方面，當時 ISA 連續幾年都有會議場次從各個角度，展開對國際關係主流研究霸權的批判，參與 ISA 的研究人員亦更加多元混雜，比如：中國學者在 2000 年以後參與 ISA 的頻率與機會增多了，同時，世界權力與財富隨著全球化重新分配，醞釀著往後金磚四國的崛起，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本土化的訴求逐漸浮現。

WBW 與 NWIRT 的最大貢獻在於肯認非西方國際關係知識與研究的主體性，並實際讓更多非西方社群參與，多數由歐美組成的全球國際關係研究圈，讓西方與非西方學者有機會直接對話，以研究議題、途徑、方法等學術見解，而非領土疆界劃分彼此的國際關係知識，從而真正有機會從學術實踐改變主流國際關係中，西方宰制/剝削/東方化非西方的二元對立關係。

肆、展現非西方能動性：比較國際政治思想

儘管 WBW 與 NWIRT，出於各自的問題意識與願望，邀請非西方知識主體參與他們的研究議程，暗示著他們必然將這種期待，投射到非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發展上，從而可能造成某些違反初衷的後果，比如：後實證陣營利用建構非西方異質多樣的認識論，揭穿主流國際關係知識的虛偽，可能冒著實體化非西方的風險²⁶；而 NWIRT 則在缺乏深度反省主流認識論的前提下，僅想利用非西方自身的概念與邏輯，建立新的國際關係理論，以解釋非西方國際關係，其忽視非西方自身渴望與知識內涵的結果，目前看來反而召喚出模擬西方的國族學派，落入後殖民狀態，比如：中國學派²⁷、日本學派²⁸ 等，招致更多霸權論述再生產的疑慮²⁹。

²⁵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²⁶ Murad Idris,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arison," *Political Theory*, (July 2016).

²⁷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2008), pp. 749-761.

面對上述困境，陳慶昌曾主張兩個研究策略，即：採用比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與參考其他人文社會科學處理類似問題的做法³⁰。因此，本文借用 Leigh Jenco 等人倡議的比較政治思想（Comparative Political Thought）主張和經驗³¹，分析非西方知識社群如何可能發展出自身的研究議程，實踐知識主體性，並反轉認識論不平等的西方與非西方關係。

就國際關係學科的訓練來看，研究國際關係似乎只能從主流或批判，兩種難以對話的研究路徑著手。由於這兩種途徑，無論是為了支持戰略、外交，還是為了抵抗霸權，具有強烈的入世抱負，從而更容易帶入自我，而難以冷靜，旁觀分析。這也是為何批判國關非常強調研究者個人的反思、責任與倫理³²。

然而，實際上，當代幾乎所有學科無一不涉入國際關係，比如：政治思想。Robbie Shilliam 主編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on-Western Thought: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Investigations of Global Modernity* (2010) 一書，不但以非西方為知識主體，更認為非西方「遭遇帝國」（imperial encounter）的經驗，及其適應西方帝國乃至整套現代化機制的思想過程，本身就應該被挖掘、分享，並作為西方與非西方彼此重新認識的資源。如果 WBW 主要以空間上的地緣文化場所作為探索認識論的切入點，那麼本書的方法，便是從「遭遇帝國」的時間點，考察由此引發、演變，進而內化

²⁸ Josuke Ikeda, "The 'Westfail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examination of Non-Western IR Theories*, Kyoto Working Papers on Area Studies: G-COE Series (2011), pp.12-42, <http://hdl.handle.net/2433/155726>.

²⁹ Ching-Chang Chen, "The Absence of Non-Western IR Theory in Asia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Vol. 11, No. 1 (2010), pp. 1-23.

³⁰ Ching-Chang Chen, "The Im/Possibility of Building Indigenous Theories in a Hegemonic Discipline: The Case of Japa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Vol. 36, No. 3 (2012), pp. 463-492.

³¹ Leigh Jenco, Murad Idris and Megan C. Thoma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³² Ken Booth, Toni Ersk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2nd* (London: Wiley, 2016).

為非西方現代性思想的內容與過程³³。持有類似研究策略的，還有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³⁴，從日本加入西伐利亞體系以來，歷經帝國化又去帝國的政治思想過程，探索日本經驗作為國際關係與政治思想研究的特殊與普遍價值。

除了比較非西方國際思想，更可以在西方與非西方認識論平等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比較國際思想的策略。參考從去殖民角度的比較政治理論議程，由 LSE 漢學家 Leigh Jenco、維吉尼亞大學的阿拉伯-伊斯蘭政治思想教授 Murad Idris 等，區域、文明研究所構成的跨文明比較知識社群研究經驗，他們在合編的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2020) 中指出，面對共同背負著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包袱的西方與非西方，要怎麼去研討超克帝國殖民遺緒的比較政治理論？他們主張：一方面，對內（西方）要求更多的反思性、改正與傾聽；另一方面，對外（非西方），採取變換參照（changing referent）、用他們自己的說法（on their own terms）與跨文化學習（cross-cultural learning）來克服不同地緣文化場所思想的不可共量性³⁵。

儘管去殖民的比較政治理論，或比較國際思想，設定的研究目標與手段相當理想樂觀，但仍是值得嘗試的方向。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隨著 WBW 的個案研究與專著越來越多，本身逐漸構成一個可以相互比較的研究材料，同時，以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為首的清華學派，也正在漢學家、印度學家、國際關係學家的合作下，開展中印國際思想比較³⁶ 研

³³ Robbie Shilli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on-Western Thought: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Investigations of Global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2010).

³⁴ Felix Rosch, Atsuko Watanabe, *Modern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8).

³⁵ Leigh Jenco, Murad Idris and Megan C. Thoma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³⁶ 〈中印國際思想比較研討會成功召開〉，
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246/2017/20170427173740647626929/20170427173740647626929_.html.

究，並從中發現某些可以對話的共同主題，進而可以採用上述的方式，嘗試跨文化學習。其二是透過這個比較過程，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得以跳脫西方/非西方的標籤，研究者可以大步邁入自我/他者相互構成、文明之間相互取用等現象背後，體現的關係的多重性 (*relational multiplicities*)，進而從關係的，而非實體的全新認識論，重新想像國際關係。

伍、結論

本文回顧了非西方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他者角色，即：作為驗證主流國際理論的經驗資料庫，以及不需要關心與學習的學術落後者，如何藉著參與後西方時代的新興國際關係議程，例如：*Worlding Beyond the West*、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非西方國際思想等，從被動的知識對象，成為具有積極性的知識主體，說明了帶有批判、反省意識的非西方知識社群參與，不僅正在改變、動搖國際關係學中的西方/非西方關係，還能轉換國際關係研究的主題與視角，從而有助於重新想像國際關係。

責任編輯：賴文媿